

人口因素如何影响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内容摘要: 中国过去一直保持 10% 的经济增长速度, 2010 年以来人口红利消失后, 潜在经济增长率马上降下来。如果我们不接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事实, 同时国际上还有强劲需求, 那么我们很可能还继续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 而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偏离。但是欧美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国际需求下降, 这反而给我们一个进行速度调整的机会, 换句话说就是我国被迫接受调整。这是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意外之喜。因此, 不应该通过拉动需求来使经济发展超越潜在增长率, 但这并不意味着潜在增长率不可以提高。在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背景下, 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关键词: 人口红利 潜在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 户籍改革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13)06-0101-013

一、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

自 1990 年代后期爆发亚洲金融危机, 以及 2008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中央政府都坚定要求经济增长率保 8, 这背后意味着如果达不到 8% 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就不能解决每年 2000 万人的就业问题。2012 年中国经济没有达到 8% 的增长速度, 且年初也决定不保 8, 其结果并没有对就业发生显著冲击。至 2012 年 9 月份, 当年新增就业任务已经完成 114%, 登记失业率 4.1%, 与往年并无二异。

图 1 曲线表示的是求人倍率(以劳动力市场上岗位数做分子, 寻职人数做分母)近年来的变动趋势。2012 年它大于 100%, 比往年都要高, 并且逐年提高。同时有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调高最低工资, 说明目前还是存在雇工难问题。由此, 主流仍是招工难的问题, 并不是失业问题。所以虽然经济增长率没有保 8, 但就业却没有出现问题。

为什么没有出现失业问题? 当我们说经济增长会影响就业的时候, 说的并不是绝对就业, 而

收稿日期: 2013-05-10

* 本文系作者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第 80 期上海沙龙上的主题发言, 根据录音整理。

作者简介: 蔡昉(1956-): 经济学博士,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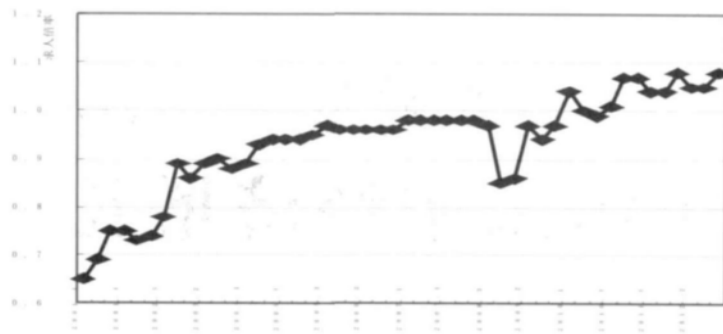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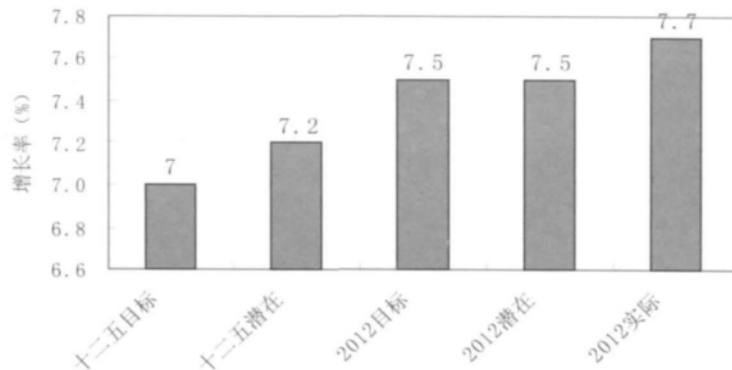


图 2

是指宏观经济下降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的增加。宏观经济不好的定义是指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实际上 2012 年中国经济虽然没有达到 8% 的增长率,但它并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

由图 2 可见,7% 的增长水平是“十二五”目标。根据我们测算,“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长率是 7.2%。而 2012 年年初定的目标是 7.5%,高于潜在增长率。实际上 2012 年的潜在增长率比“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略高,也是 7.5%,而 2012 年最终实现的增长速度是 7.7%。也就是说在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 7.5% 或者 7.2% 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潜在增长率的前提就是假设充分就业,其含义就是在充分利用资源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可能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的失业。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呢?我认为主要是由人口因素所致。在改革开放以来整个时期内,中国人口的变化,主要看 15~59 岁劳动年龄的人口变化。

图 3 表明,截至 201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一直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因为人口抚养比是以劳动年龄人口作分母,依赖型人口作分子得出的比值,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增加的同时,抚养比也会持续下降。

如果我们破除长期以来马尔萨斯的说法——人口的数量增长率影响经济增长率——就会发现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从图 3 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人口结构变化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添加了一个额外推动作用。如果人们想通过计量方法算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到底有多大,通常要找一个变量放入经济增长模型里。这个变量就是抚养比。因为抚养比代表负担,抚养比下降意味着负担轻、储蓄率高,意味着劳动年龄增长。从整个经济增长理论来说,其实人口抚养比在统计上只不过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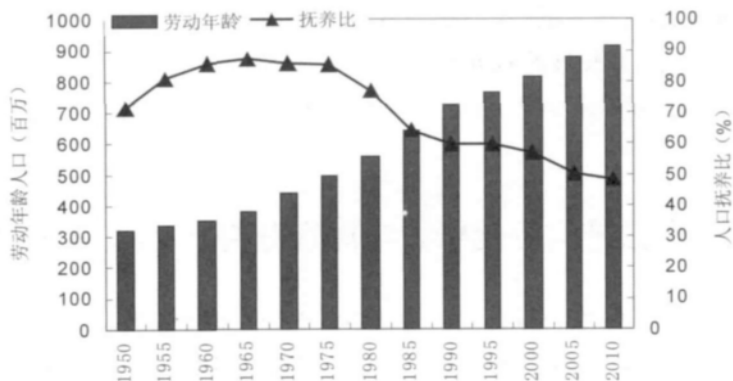


图 3

个残差——人口红利的残差。人口红利体现在所有经济增长源泉当中,或者说所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变量当中,而那些没有囊括的因素都进入到人口抚养比变量中。

在中国过去 30 多年每年接近 10% 的经济增长速度当中,最大的贡献来自于资本积累。从图 4 看,差不多 70% 来自于资本积累。资本不仅仅是物质资本的投入,也和人口因素密切相关。如果没有人口红利的支撑,经济增速不可能维持资本贡献 70% 的情形。原因在于:第一,人口变得越来越具生产性、负担轻,从而实现高储蓄率、高积累率、高投资率以及高资本形成率,这是一个条件。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假设资本报酬递减,克鲁格曼也曾批评东亚模式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提高,但他忽视了在中国、甚至在东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存在人口红利。在这种劳动力要多少有多少的情况下,就可以不断地投入资本去跟劳动力匹配,从而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虽然这种现象终究还会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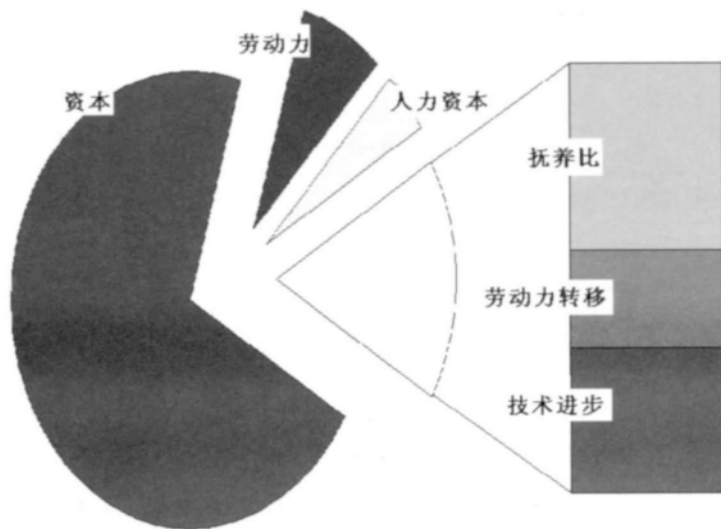


图 4

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可以不发生,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比较优势。但绝对的报酬不递减其实也是不可能的。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存在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克鲁格曼批判东亚模式,其中主要是拿新加坡做例子,但新加坡曾连续 40 年积累率高达全球最高的 50%,同时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这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一方面可能在于数据不准确、计算不准确,

它不可能没有报酬递减;另一方面也在于新加坡有一个特点,当它自身人口红利消失时,它采取了大量使用外工的方式。新加坡的GDP中有40%是移民创造的,因此,新加坡可以不受自身劳动力短缺的约束。总之,因为有剩余劳动力,资本报酬不递减,所以才能够保持资本积累持续快速推进经济增长。

二、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

进一步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发现有其中一部分是技术进步,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采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率。也许我们还没看到这跟人口红利有多大关系,但还有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由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产业部门引起的。因为劳动力资源,会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这种转移本身就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它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接近一半。从整体来看,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虽然不能说就是靠人口红利来推进的,但在所有推进经济增长源泉当中都有人口红利的因素,都有有利的人口结构变化的贡献。因此很自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了,那么中国整个经济增长源泉都会发生不利的变化,从而使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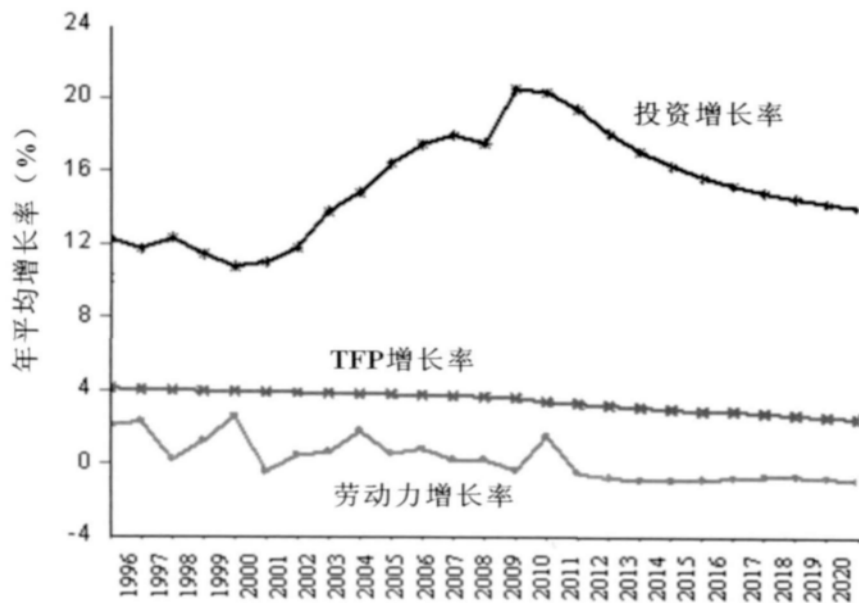


图5

事实上,中国人口结构的确发生了变化。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15~59岁)人口达到了最高峰。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绝对减少的趋势。同时,跟它相关的人口抚养比2010年达到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呈现出绝对上升趋势。所有有利的人口结构都在这一时间里发生了转折,而这一年很重要,这是“十一五”时期和“十二五”时期的交界点。

为什么假设未来资本的投资增长速度要减下来?如果要减少的话,大致上怎么减呢?究其原因,从图7可以看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实实在在发生了,不仅仅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些年我国的年资本边际回报率大幅度地下降,而且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我国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大幅度地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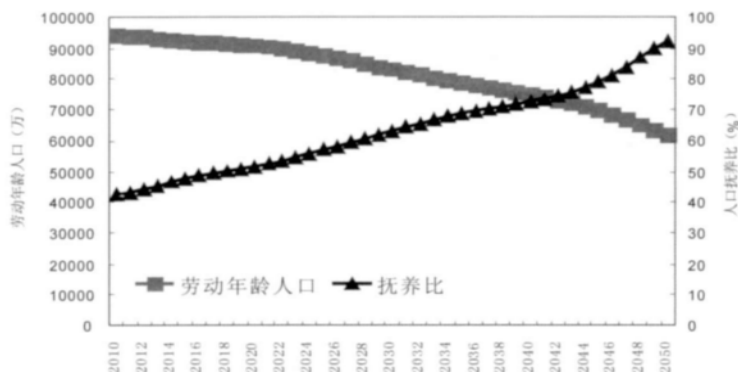


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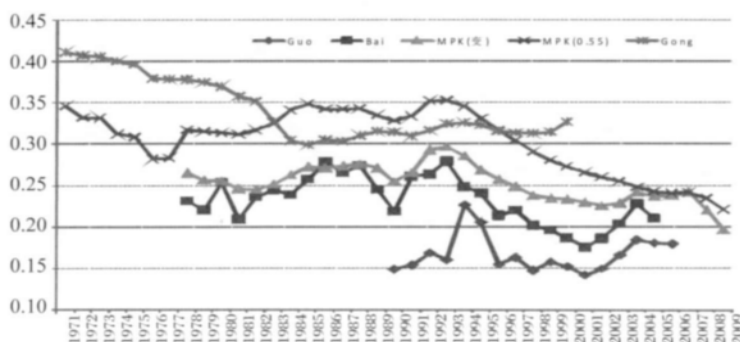


图 7

在回报率下降且政府不予以补贴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家会不愿意再继续投资,我们不可能再有这么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基于以上假设,分析各个时期的潜在增长速度:从改革开放一直到1995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10.29%,1995~2009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9.8%,其中“十一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10.5%,稍大于这一期间的平均水平。估计“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更低,仅为6.1%,潜在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降。以上数据表明由于受人口因素的影响,潜在增长率会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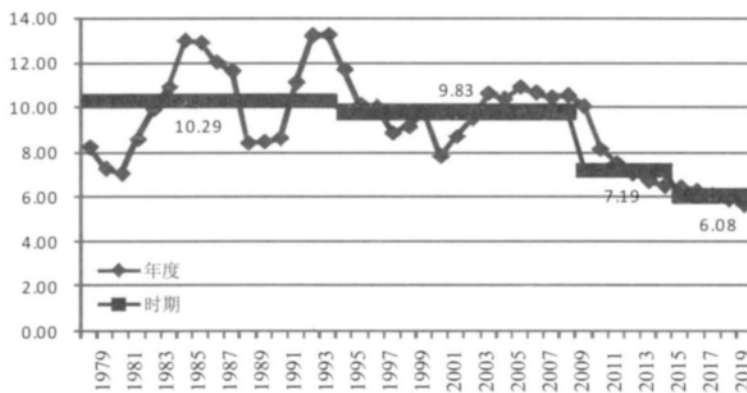


图 8

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面对降下来的潜在增长率,经济学家会向政府建议说我们还有很多经济增长点,比如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以及解决“铁公鸡”问题等。政府认为经济学家们提的建议都很好,因为这些建议都有抓手,具有可操作性,可以通过区域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等一揽子刺激方案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外国人也提出中国经济要硬着陆,要赶紧采取一些刺激办法。他们向我们提建议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对其他国家越有好处,因此大家都在往一处使劲,目的都是要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要把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那么怎样才能把实际增长速度拉到潜在增长速度之上呢?经济学家们之前的建议大多强调通过拉需求因素来提高经济实际增长速度,但是潜在增长率是由供给方决定的,其中包括资本供给、劳动力供给、生产率进步等因素。没有触动供给而仅仅去拉需求的做法可谓是南辕北辙,至少到今天为止,实际上还不需要通过拉动需求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根据测算,“十二五”期间供给方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7.2%,那么我们的需求因素能否满足7.2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提出的要求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的计算,我们对过去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得出的结果是消费需求的贡献率是每年4.5个百分点,投资需求的贡献率是每年5.4个百分点,而出口需求的贡献率只有0.5~0.6个百分点。将所有需求因素拉动的增长率累加起来,增长速度接近10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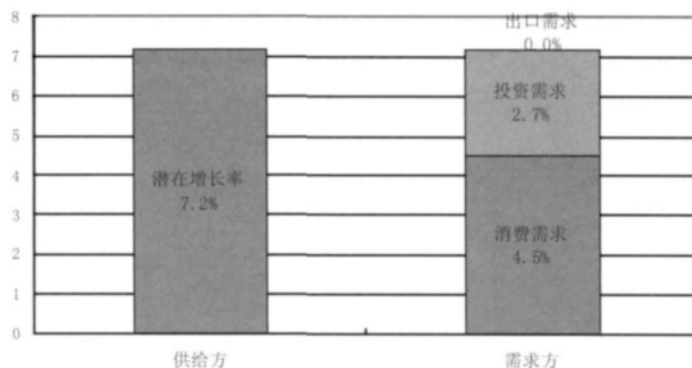


图9

我们先做两个假设:首先假设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未来出口需求为零,当然我们并不希望它是负数。再者假设投资需求的贡献率减半,这是因为我国之前过分依赖投资需求造成了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加上过去几年一揽子刺激方案又留下后患,因此做出投资需求的贡献率降一半的假设,即从原来贡献5.4个百分点降低为只贡献2.7个百分点。而消费需求的贡献不发生变化仍为4.5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只要潜在增长率增长,就业就是充分的,能保证居民的收入增长。最后把4.5个消费需求贡献和之前投资需求贡献的一半即2.7个百分点加起来,得出的结果是需求对经济总的贡献是7.2个百分点,这说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经得起需求的支撑,即使现有的出口需求降为零,甚至投资需求降一半,还是可以支撑的,因此我们并不需要通过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刺激需求可能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造成通货膨胀、产能过剩、扭曲要素价格、背离比较优势,直至出现经济泡沫等问题。举例分析,首先是产业政策失误的例子:我们过去擅于用

产业政策来刺激需求,图 10 中红线是 2012 年工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实际产能利用率大大低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大多集中在战略型新兴产业上,比如汽车、钢铁、船舶、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不可否认,过去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探寻未来比较优势,但经济增长速度不够时动辄就用产业政策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上述所说的问题很有可能就会悄然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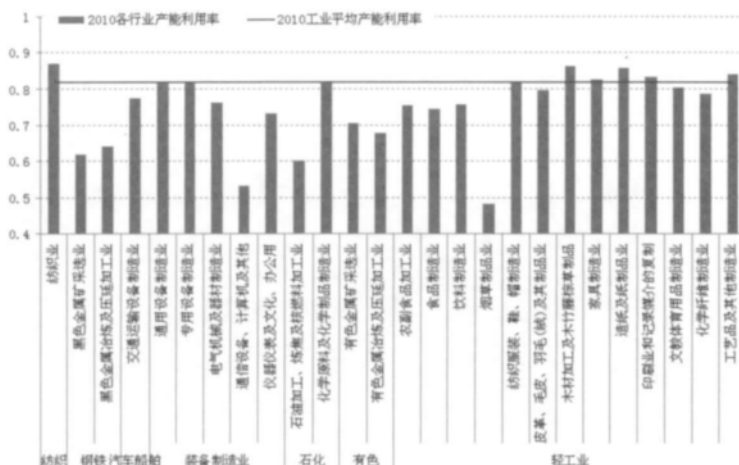


图 10

一些区域政策像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都是为了平衡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而制定的一些政策。但是如果拿它来做投资引导、刺激经济增长的话,会出现什么后果呢?通过图 11 即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加以说明。目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比率)已经大大高于沿海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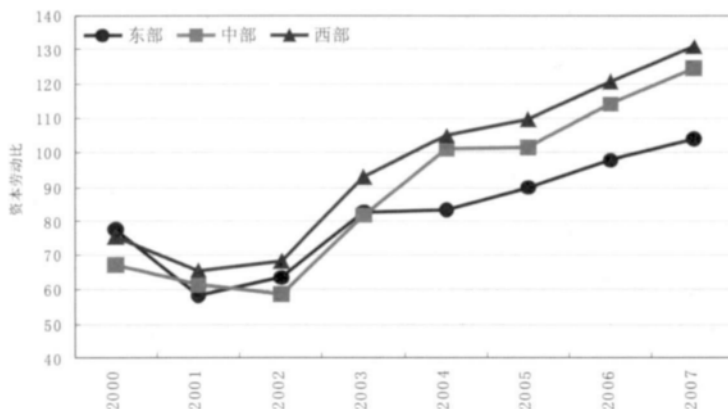


图 11

从理论上来说,相对发达的地区资本相对充裕一些,其资本密集度高,而相对落后的地区资本密集度相对较低,更应该节约资本。但事实上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远高于东部地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西部已经偏离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是一种潜在的错误。

1990 年是日本人口红利消失的年份,早在 1970 年之前日本就获得了人口红利,也因此取得 9.2% 的平均增长速度。1970 年左右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后人口抚养比没有马上提高而是稳定在那个水平,但实际上它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日本那时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它的产业界、政府和老百姓都不愿意接受增长速度下降的事实,因此他们就简单地认为日本问题是由

需求不足引起的。于是他们采用了许多办法,比如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来刺激经济增长,其结果导致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经济泡沫。经济泡沫破灭之后,1990年开始,日本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而其经济则进入零增长时代,日本从1990年到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只有0.24个百分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吃亏就吃亏在不愿意接受下降的潜在增长率,而下降的产业增长率也是人口红利消失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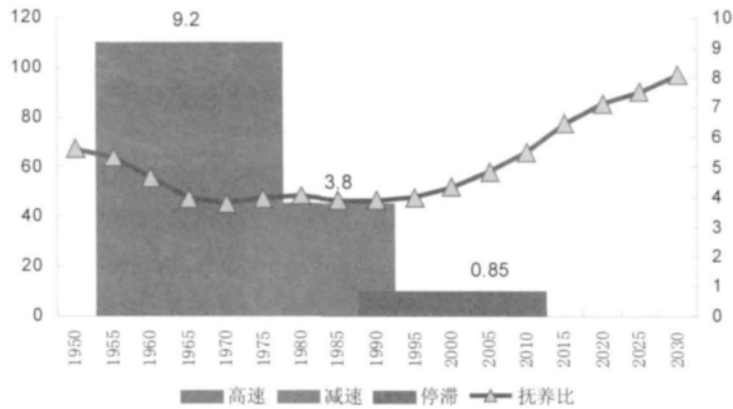


图 12

虽然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讲潜在增长率,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明白。举个简单例子,潜在增长率相当于刘翔的潜能,就是肌肉、骨骼、年龄以及人的极限。那么需求因素会起什么作用呢?体育部门的好大喜功、老百姓不懂体育科学以及广告商的唯利是图等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需求过高,远远超过刘翔的潜在增长率,结果是导致刘翔会不断地受伤。

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去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国过去一直保持10%的增长速度,但因为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因此“十二五”一开始,潜在增长率马上降下来。如果我们不接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事实,假设国际上还有很强劲的需求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还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这会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偏离。但是恰逢欧债危机,美国也遇到了麻烦,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国际需求下降,反而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进行调整,换句话说就是我国被迫接受调整。这也是2012年我国的一个意外之喜,虽然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刺激经济,但中央政府挺住了,并没有采取过分的措施去刺激经济。

总之,不应该通过拉动需求因素来超越潜在增长率,单凭拉动需求因素来超越潜在增长率会产生一系列潜在的后果,这并不意味着潜在增长率不可以提高。那么到底靠什么提高潜在增长率才不会造成上述所说的后果呢?人口红利消失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做的有两件事:一是提高劳动力的供给,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提高劳动力供给方面有一个制约,即劳动力在数量上是不足的,劳动力的负增长是必然的。因此应该提高的是劳动的参与率,也就是在既定的人数中有更多的人参与就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自3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的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必然是有利的。二是提高资本劳动比(即用机器替代劳动),但这种替代并不是无限的。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教训就是不能过度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说不能过度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呢?日本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图13中最右边的条形图是日本在1991~2000年失去人口红利的第一个10年,其劳动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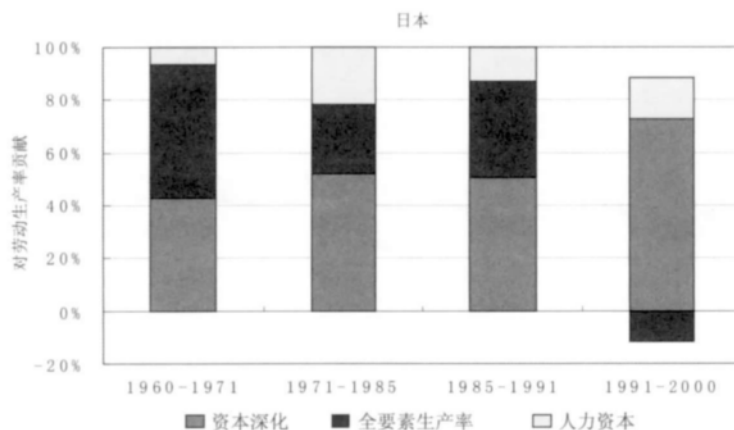


图 13

率的提高中,人力资本、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 3 个因素的贡献份额。第一块黄色部分即人力资本的贡献。第二块蓝色的部分即资本深化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出 94% 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靠资本替代劳动即用机器替代人来达到的。第三块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它是负的 15%。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没有人口红利之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唯一来源几乎就是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日本在这整个 10 年里全要素生产率每年都在下降,可见日本没有经济增长是必然的。这是我们要吸取的一个教训。

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图 14 中粉色的趋势是在保持人力资本、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三个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2011~2020 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我们可以看到潜在增长速度呈现出下降趋势。首先,假设我们的劳动参与率逐年增加 1 个百分点,即从目前劳动参与率 70% 左右,第一年加到 71%,第二年加到 72%,以此类推,每年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 0.88 个百分点,接近 1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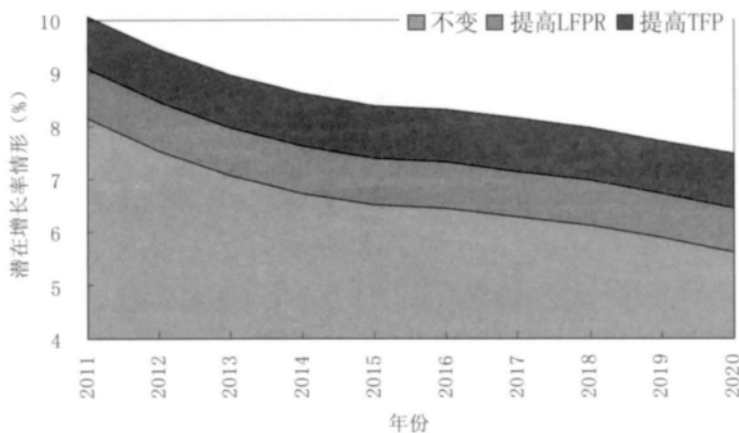


图 14

再者,假设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也增加 1 个百分点,比如过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是年均 3%,变成这 10 年里年均增长率是 4%,潜在增长率又能提高 1 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到了 2020 年时候,在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提高 1 个百分点的情况下,潜在增长速度增加了 1 倍。以上模拟说明,既定的潜在增长率不是宿命而是可以改变的。但改变的途径不是靠需求拉动,而是要通过其他途径提高潜在增长率自身。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岁数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目前不可能靠延长退休年龄来动员这部分人成为劳动力,因为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解决这部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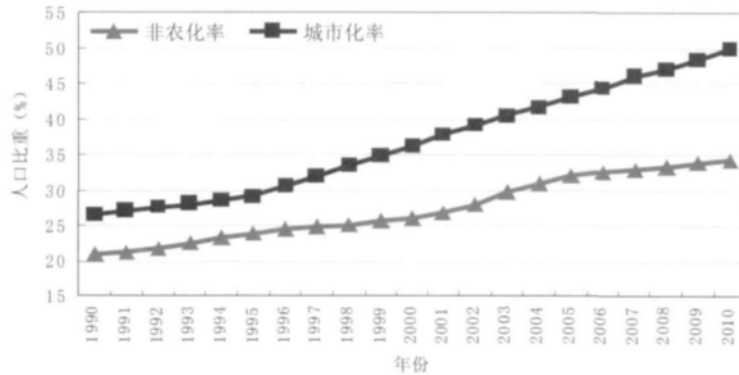


图 15

图 15 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城市化率是 51.3%,但是要按户籍人口算,就是按非农业户籍人口来算,我国的城市化率目前则只有 34.7%,这两个数据之间差 16、17 个百分点。两者差这么多,是因为有 1.6 亿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但没有取得城市户口,这类群体面临着就业不稳定的压力,一有风吹草动就回乡。再者因为他们没有社会保障,他们无法预期在城市养老,因此他们通常在 40 岁左右就退出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虽然他们还可以回家干活,但由于他们退出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这就降低了劳动的总体参与率。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继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来提高劳动参与率。当我们讲“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候,不是说剩余劳动力完全没有了,而是指用原来不变的低工资水平达不到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因此为了加快剩余劳动力转移,工资得不断地上涨。

从图 16 可知,过去这些年农民工的增长速度是趋缓的,但农民工月实际工资是迅速增长的,即使这样我们目前还是不断地遇到招工难、民工荒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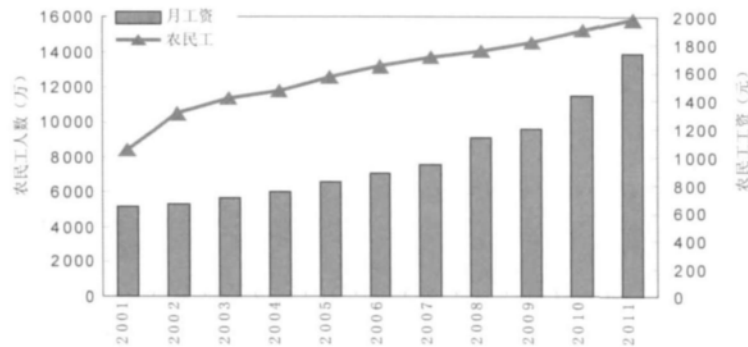


图 16

2011 年农民工工资实际增速是 21%,继续用提高工资这一个手段来增加农民工劳动力供给是行不通的,工资再高的话对企业来说人力成本压力就太大了。因此要让农民工劳动力供给保持下去,但不能太快,这就需要用公共政策改革即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进城务工更容易得到社会保障,更容易落户,有更好的预期。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地转移,继续转移不仅能增加劳动力供给,而且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部门转移。总的来说,就是不能让市场继续通过不断提高工资来加强剩余劳动力转移,而是要用公共政策来部分代替市场的作用。

四、通过改善人口素质和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提高人的素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我国目前的就业结构主要是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未来产业结构升级中,若转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要求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从9.1年提高到9.6年;转到第二产业资本密集部门,要求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提到10.4年;而要转到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上去,要求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提到13.3年(如图1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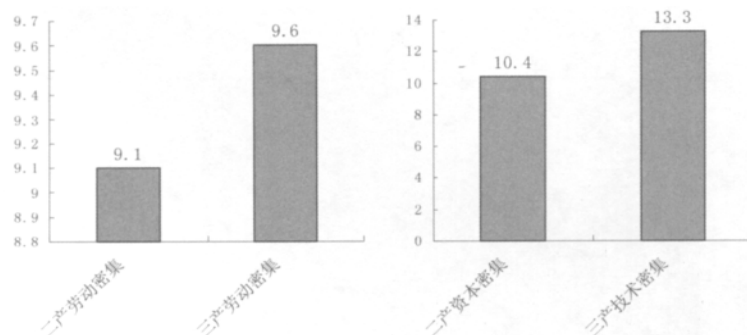


图 17

看上去要求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增加不了多少,但实际上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增加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发现,中国成年人的受教育程度经过10年才可以增长1.3年(如图18所示)。因此为实现就业结构的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要早做准备、多花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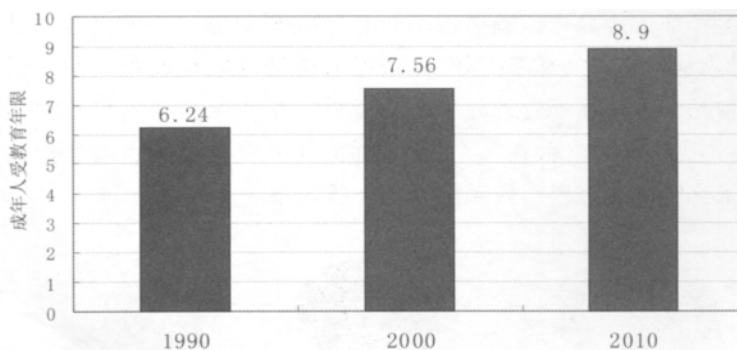


图 18

如果要延长我们的受教育年限,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国义务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百分之百,如果想延长受教育年限,提高劳动者素质,那么受教育者必须上高中、上大学。所以如果没有高中和大学的继续扩招,我们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不可能提高上去。

第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首先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进行。从图20可以看出,中国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还有很大技术差距,有巨大的技术差距意味着我们还有后发优势。意味着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更快的途径去达到技术的更快进步,在这个时候不能让所有的领域都搞自主创新,如果是那样的话,等于我们自己放弃了后发优势。

其次,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改革进行。如图21所示,我们过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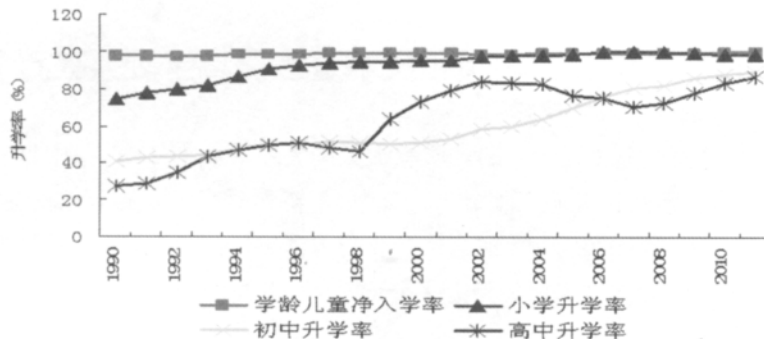


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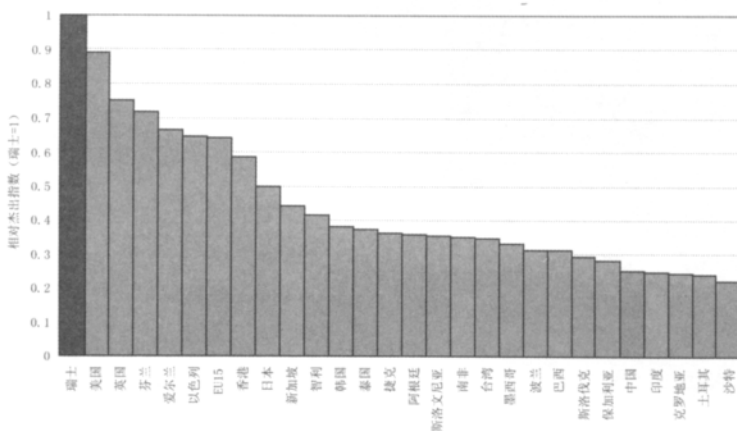


图 20

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从而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今后我国剩余劳动力会减少,相应地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也会降低。在一个产业内部,比如第二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力的差距。而在一个行业内部,各个企业之间也有生产力的差距。如果能够缩小这个差距,那么仍然可以获得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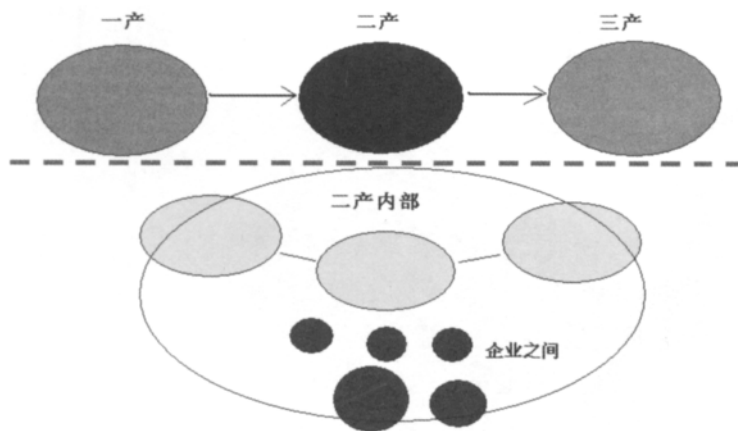


图 21

目前有 3 个不同的研究,即 3 个 30%。第一个研究表明,现在像美国这样的成熟社会,它的全要素生产率有 30%~50% 来自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的消失。也就是说没有效率的企业退

出市场,有效率的企业把其他企业的资源都拿过来,这种企业的生生死死、退出和进入机制是我们所没有的。第二个研究涉及到中国,研究表明,我们中国部门内企业间的边际生产率差别是巨大的。如果把把这个差距缩小到目前美国的程度,那么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这两个研究完全是由不同的人做的,但他们都得到同样的30%~50%,两个研究结合到一起得到的结论是:西方国家目前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一半的源泉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第三个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

将上述由3个完全不同的人所做的研究综合起来看,可以说第一个研究说明全要素生产率应该从哪儿得,而第二个研究表明我们没有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然后第三个研究揭示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垄断性质。国企垄断在那儿了,它不退出,其他企业就不能进入,因此有效率的企业就不能替代无效率的企业,结果是不能有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制度环境,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是要通过改革来进行的。

克鲁格曼批评东亚模式,新加坡人不高兴,直到多年以后李光耀遇到了克鲁格曼,还跟他争论。当然争论归争论,新加坡政府还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们把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作为国家目标。新加坡具体实施过程我们还没有研究,但新加坡至少通过克鲁格曼的批评,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管怎么说都是有益的,但目前对我们来说却很难实现。其实新加坡的争论说明两个道理: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确重要。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采取正确的政策去改善它,那么是有收益的。所以新加坡40年50%的积累率,却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虽然不很真实,但也说明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是健康的。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就是一个统计残差,不要过分地在意它的数量概念,应该以理解它的基本含义为主。□

How Demographic Factor Plays Influence on China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i Fang

Abstract: China has maintained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10% formerly, but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immediately decreases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2010. If we don't accept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slowed down, as well as the strong internationally demand exists, it could keep the high speed of development while the real growth rate cannot match with potential growth rate. The European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makes internationally demand decrease which give us a chance to adjust speed. Actually, It is a unexpected chance for us to promote sou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that we should improve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by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 supply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nstead of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high labor cost.

Keywords: Demographic dividend;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Economic growth rate; Whole elements growth rat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